

January 2016

Qian Gurong i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1949 to 1966

Jianjun X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Xu, Jianjun. 2016. "Qian Gurong i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1949 to 1966."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1): pp.53-63.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1/13>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十七年文学”中的钱谷融

许见军

摘要:“十七年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文学生存时期,政治对文学的强制规范与文学对政治的反叛、逃离同时并存,其间潜藏和交织着“一体化”的文学规范和异质的文学批评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在此历史境遇中,从国统区跨入新中国的钱谷融经历了从政治认同身份的焦虑到文学身份的回归,再到“人学”坚守的三个重要的人生阶段。在每一个阶段中,钱谷融都做到了不失自我,保持自我,体现了铮铮铁骨的文人气息,为无数后辈学人树立了可贵的人文标杆。

关键词:“十七年”; 文学批评; 钱谷融; “人学”

作者简介:许见军,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学、古代文学研究,电子邮箱:junjianxu78@126.com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跨文化语境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研究”[12BZW018]的阶段成果。

Title: Qian Gurong i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1949 to 1966

Abstract: The first seventeen year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P. R. China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49 to 1966) is a special period for literary survival. In this period, the constraints and restraints of politics on literature co-exist with literature's rebellion against and escape from politics, which are intertwined with the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integrated” literary norms and the heterogenic literary criticism. Under this historical context, Qian Gurong went through three important stages in his life, namely, the anxiety of political identity, the return to literary identity, and the adherence to “humanistic study.” In each stage, Qian Gurong managed to maintain an integrate self-identity of a humanistic scholar.

Keywords: “the Seventeen Years”; literary criticism; Qian Gurong; humanistic study

Authors: Xu Jianjun is a PhD candidate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specializing in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ncient literature. Email: junjianxu78@126.com

钱谷融高寿,在学界享誉甚久。其声誉的确立与《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等文章有重大关联,所以,学界往往聚焦于《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等文章的学理价值,却对其写作这些文章所具有的复杂而微妙之心理状态有所忽视,没有进一步体察钱谷融的历史处境及其生存状态,而这恰恰是客观评价其文学活动和文学批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前人文学活动与文学批评的评价,不仅需要当代学者有新的视角与理论,追问前人的独特创见,还需要尽可能地知人论世,对当事人的历史处境和

生存状态进行追溯与合情合理的历史还原、想象,体察他们的时代语境与学术创新发生的心理动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对前人的学术成果做出实事求是的整体评价,推进学术的研究与创新。

《“十七年文学”中的钱谷融》便是在此历史境遇下提出的。庄锡华教授曾说:“历史的变迁往往成为一些人思想发展、转换的契机,因为这种变动了的现实会使一些人重新发现自己或重新认识生活。随着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力量的分化与重组,旧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的解体与建构,人

人都存在一个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或寻求自己的合适位置的问题”(102)。而从国统区进入新中国的钱谷融,在新的历史境遇中,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解放前的人生观和文艺观,提出“文学是文学”的新文艺思想,以此来调整自我、适应新的现实境遇,其内心交织着欣喜、希望、失落、焦虑、愤怒等复杂情愫,体现了他艰难而曲折的心路历程。

一、自我否定:政治身份认同的焦虑

1950年5月,钱谷融以高校教师的身份,被派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进行半年的政治学习,并在学习结束之后提交了一份思想总结。

尽管现在这份思想总结并不完整,只有谈人生观的第一部分《我摧毁了“桥”的人生观》和第二部分谈文艺观的题目《我跳出了“绿色的陷阱”》,其余的都没有保存下来。但从这两部分的题目,我们发现他似乎否定了自己以前的人生观与文艺观。并且钱谷融在《我摧毁了“桥”的人生观》中这样写道:“来到革大,学习了劳动创造世界和五种生产方式之后,我对‘人生之桥’的看法更完全变了[……]于是,我摧毁了我‘桥’的人生观”(《艺术·人·真诚》619)。

然而,使人迷惑的是,钱谷融在九十年代回忆这段经历之时,却坚决地否定了他的这一说法:“本来,‘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何况我这种最初的秉性,又经过了几十年环境、遭遇的培育熏陶,岂是短时期内某种外在形式的变化所能彻底改变得了的?……因为我的习性,我的志趣好尚,在解放前就早已铸就定型,牢不可破了”(《艺术·人·真诚》619)。

对于钱谷融在不同时期的矛盾表述,我们该如何解读呢?

如果我们联系当时的政治语境和人的心理变化规律来看,这个问题也就不难解释了。建国初,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教育和改造从国统区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的资产阶级政治立场,让他们回到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需要,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尤其是从国统区直接过来的知识分子,是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的重点对象。而作为直接从国统区进入解放区的钱谷融,必将与其他知识分子一起经历政治“洗澡”和意识形态的规范过程,

参加思想改造运动。

钱谷融的这份思想总结,就是文艺界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结果,实际上是钱谷融的一次自我批评、检讨与反省。而思想改造运动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就是迫使这些知识分子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以便团结和利用他们。为此,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经过这次为期半年的政治学习,钱谷融不得不做出政治选择,在自我反思与批评的思想总结中,承认新生政权的领导地位,在政治立场上与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政治理念基本保持一致。正如学者崔晓麟指出:“通过组织高校知识分子参加政治学习运动、社会实践运动、思想批判运动以及忠诚老实运动等从外围铺垫进而内里廓清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基本实现了高校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组织认同,从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及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中的领导地位”(“重塑与思考”170)。

然而,客观地说,虽然“新政权建立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使各阶级、阶层的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令人欢欣鼓舞的变化,但是社会地位的改变,在短时间内根本来不及转化为一种心理素质,当时的知识分子还主要是传统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所塑造的人,仍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那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养成的文人性格”(崔晓麟,“建国初期知识分子”141)。换言之,政治运动是可以改变人的一些问题,但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精神基因和文化性格,因为人的意识问题是需要一个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才有可能发生变化的。

因此,钱谷融此次所谓的“变化”只是其政治立场的改变,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所做出的自我调适的艰难选择,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自己的人生观与文艺观,只是在“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中,不得不对自己的个性与文化基因进行压抑。这种压抑的根本原因在于钱谷融之前的悲剧人生观与唯美文艺主张和新的时代语境所发生的根本冲突。具体来说,这种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新中国的建立给予他们更多的是人生的希望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而这恰恰与新生政权所期望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而钱谷融之前的悲剧人生观,旨在宣扬人生的虚无:“人生原来就是一串串希望与失望的连

锁呵!”(《散淡人生》36)。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就自然而然地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因此,他不得不对自己以前的悲剧人生观进行反思,并自觉地进行过滤和压制。

其二,建国之初所实行的文艺政策,是延续延安时期的战时文艺政策,其根本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精神,强调文艺的政治属性与阶级性。很明显,钱谷融之前的唯美文艺主张,却是强调文学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和对个体心灵的陶冶:“对我们这个世界来说,文艺(音乐、美术、文学等等)犹如清风明月,犹如鲜花美酒。它能使朽腐化为神奇,使枯淡变为灵妙。它使这尘浊扰攘的世界变得光怪陆离而万分动人心魄了”(《散淡人生》55):“假使有一天,我能重见阳光,我的心头又有了热力、有了爱增了,那么我也不敢有别的奢望,只希望能多跌几个人到我的绿色陷阱[按:“绿色的陷阱”即钱谷融的唯美文艺主张]中来,使我能得到些许心灵的安慰”(《散淡人生》40)。可见,这与建国初文艺界所宣扬文学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和文学的阶级战斗性是格格不入的,因此,钱谷融的调整便是必然之事。这种审美趣味的转移突出表现在钱谷融积极主动地翻译有关评价高尔基的三篇论文:《〈母亲〉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高尔基作品中的劳动》、《高尔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篇文章是钱谷融从英国和美国刊物上的转译,而不是从前苏联直译过来的,因为他不懂俄语。这固然与新中国建立之初,全面学习苏联,包括文学艺术的学习,很多苏联的文艺理论、文学作品被介绍和引进国内的客观影响有关,但这也与他的审美趣味的转移有关。而且从这三篇译文的主题来看,它们旨在宣扬无产阶级的文学观,比如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劳动与革命、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其中充满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可见,钱谷融在建国之初,确实很亢奋,自觉地重新审视以前自己的唯美文学主张,并体认了文学具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即他自述的《我跳出了“绿色的陷阱”》。

当然,政治的被迫性只是钱谷融调整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然选择,因为他也有不做调整的权利。因此,这种压抑除了政治需要的被迫选择之外,更主要的是钱谷融内在行为的“自律”因素。所谓“自律”是指钱谷融自觉地体认一种理念,坚

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并用这种理念去要求自己。

一方面新中国建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冲击了钱谷融的心灵世界,使他体会到了以前在旧时代所没有的欣喜与希望的人生:“终于,上海解放了,我的欢喜真是诉说不尽。只有在那时,我才真正懂得了、真正体会到了‘解放’二字的真义。尽管天空在下着雨,我却有天朗气清、阳光灿烂的感觉。原来死寂的街头,忽然拥满了人,都各各表示出了他们衷心的喜悦。这光景太感动了!”(《艺术·人·真诚》618)。

的确,对于一个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钱谷融来说,远离战争,结束远走他乡、漂泊流离的生活,渴望和平和安定,回到故乡,过上有尊严的新生活,应是其最大的愿景。而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和上海解放,使得钱谷融的这一愿景从梦想变成现实,重新给予他心中燃起人生的希望,使他体验到了以前的悲剧人生观在新中国的不合时宜,必须做出适当的改变,才能适应新景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他解放前形成的“桥”的人生观:“多日的希望,一旦实现,梦想已成为事实,我还能说‘人生如梦’吗?还能说‘一切都是虚幻的’吗?从大家的狂欢里,我看到了中国人民过去所经受的血泪痛苦,看到了他们对领导他们获得解放的中国共产党的由衷感激。所有这些,再也不同于我过去所认识的个人一己的哀乐,那只是掠过心头的刹那的幻影。……我对于我假想中的‘桥’,也开始有了一些新的看法”(《艺术·人·真诚》618-19)。

另一方面,短暂的“革大”政治学习,也使钱谷融从思想上认识到劳动与人生的密切关系及其重大价值:“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又创造了世界。今天社会上的一切财富,人类所享用着的一切精神的、物质的文明,有哪一样不是劳动的成果?这些都是一点一滴地、日积月累地在劳动人民的惨淡经营中积累起来的”(《艺术·人·真诚》619)。

因此,钱谷融自觉地对自己以前虚妄的悲剧人生观进行反省:“每跨越一座桥,我们就前进了一步,我们的心头就多了一重喜悦。谁说桥是虚妄的呢?谁说人永远只是生活在希望与失望的连锁中呢?”(《艺术·人·真诚》619)。

为此,钱谷融此时期的政治选择和对自身个性与文化基因的压抑,表征出钱谷融的矛盾心态:

一方面对新生政权给予希望,充满理想的期待,但另一方面又对它显示出潜意识的焦虑,充满了犹豫和怀疑。所以,以钱谷融为个案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管窥出建国初“知识分子的个体情况是复杂的,社会心态也是复杂而微妙的,总的心态表现为以喜为主,喜忧交织,主动适应,积极调整。但知识分子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基本上是自自觉地选择了共产党和新中国”(崔晓麟,“建国初期知识分子”141)。

二、反思与纠结:文学身份的回归

如果没有以后政治运动的持续发生,钱谷融的“人的文学”探索可能就此结束。但1952—1953年出现了文艺整风运动,对具有人性和人情思想文学作品进行批判;1955年又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从学理上讲,这两个运动本应是文艺上的正常论争,结果都被上纲上线到政治事件而遭到批判,使运动中的当事人受到伤害,再加上此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流行文学即政治的教条主义理论,这种公式化、概念化和简单化的做法,最终把现实中的“人”和文学中的“人”彻底埋葬,使文学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

事实上,这些政治运动的发生,扭转了钱谷融对文学阶级属性的基本看法,并开始为之反思:人的阶级属性与人的复杂个性、人情之间的关系,这在客观上促成了钱谷融于1955年的10月写下了《关于〈林家铺子〉中的几个人物——一次课堂讨论的总结》的文学批评。在这篇文章中,钱谷融虽然承认在阶级社会中,人是具有阶级属性的这一客观事实,并认为在现实社会中给人划分阶级成分,是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但他却反对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划分阶级,进行简单的阶级分析,因为“所谓阶级分析,决不是只要给他划上一个阶级就行了,决不像成分决定论者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容易。所以,跟作品中的人物划分阶级,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钱谷融文集·文论卷》367—68)。

千万不要小觑钱谷融的这个细微变化,这实已显示出他与阶级论为主的主流文学观念的裂隙,并逐步恢复他的个性与文化基因,开始了独立文学思想的探索,并在理论逻辑上预示了《论“文学是人学”》的出现与成熟。

1957年,钱谷融在《文艺月报》上发表了他的经典宏文《论“文学是人学”》。在这篇文章中,钱谷融第一次全面和公开地论述了他的“人的文学”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确立人的主体性地位,反对人在文学作品中的工具地位:“但我反对把反映现实当作文学的直接的、首要的任务,尤其反对把描写人仅仅当作反映现实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论‘文学是人学’”40)。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和学术良知来讲,这篇文章实际是在宣示钱谷融个人话语与独立学术品格的完全恢复,因为“一个知识分子,处在当今之世,难得的是要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具有自由的思想”(《闲斋书简》340)。

秉心而论,20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学生态是极其恶劣的,这不仅体现在当时许多作家的艰难处境,而且也包括当时许多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的恶劣生存条件,尤其是主动与主流文论话语保持一定距离,坚持自己独立判断,永不放弃对文学审美追求的非主流文学家与文艺理论家。

在此观照之下,《论“文学是人学”》的写作,就恰逢文学生存的恶劣时期。所以,钱谷融在写作之时,除了考虑自己文学观点的学理性之外,还要考虑以何种方式与何种时机把自己的学术观点熨帖自如地传达出去,在坚守自己学术良知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不去触犯主流文论的政治权威。

为此,钱谷融首先考虑的是写作时机。对于《论“文学是人学”》的写作时机,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文章《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前前后后》中给我们作了历史的还原:

一九五七年三月,学校要举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邀请全国各地的兄弟院校代表参加。校、系各级领导早就郑重地向教师们发出了号召,要求他们提交论文。《论“文学是人学”》一文就是我响应号召,为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写成的,时间是那年的二月初。当然如果不是在刚宣布不久“双百方针”的精神的鼓舞下,如果没有当时那种活泼的学术空气的推动,我也不一定会写。即使写,文章的面貌恐怕也将大大的不同了。(钱谷融,《文学的魅力》136)

从以上所引,我们可以发现,从写作时间来看,《论“文学是人学”》不是钱谷融早就写好的,而是在受到三股外力的合力推动之后所临时写出的。这三股外力就是:校、系领导的号召,是第一股外力;第二股是“双百方针”精神的鼓舞;第三股就是在“双百方针”精神鼓舞之下所产生的活泼泼学术空气的推动。可见,从写作心态来推断,这篇文章也不是钱谷融一开始就主动和自愿所写的,而是受外力推动的无奈之作,实属被迫之举。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辨析清楚,这三股力量毕竟属于外因,外因最终要通过内因才能发生效力,因此,这也不足以构成钱谷融写作此文的充分条件,只可以叫做必要条件,因为据钱谷融回忆,当时“大家都是惊弓之鸟”(樊克宁,“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性格是“不事王侯”,《羊城晚报》),再加上钱谷融深受其师伍叔悦的影响,生性恬淡,与世无争;又喜欢懒散,爱读书却不肯动笔,从这两个因素来看,他是完全可以不写的。

据笔者所见,《论“文学是人学”》写作的根本动力应是钱谷融的文人氣息。钱谷融曾给别人的信中这样解释道:“你聪明散淡,应该可以活得洒脱些;但你文人氣息太重,又难免不合时宜。看来,你的一生,将永远在这两种境地之间徘徊”(《闲斋书简》463)。尽管“文人氣息”是一种可贵的品质,但与世俗总有不合时宜的一面。虽然这是钱谷融在劝导别人,不妨以此来体察他此时的复杂心境:一方面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这是自己上级领导的号召,显示出他身不由己,必须做出一定让步、妥协的无奈心情;另一方面是充满担心与忧虑,因为他深知自己的文学见解是不为当时的主流文论所允许的;最后,自己的学术良知又迫使他不得不说,否则,这份违心的自责与痛苦也将伴随他、折磨他。

除了写作时机之外,钱谷融考虑更多的是写作方式。而他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文章题目的确定。钱谷融认为“高尔基曾经做过这样的建议:把文学叫做‘人学’”(“论‘文学是人学’”45)。所以,他便把文章的题目确定为《论“文学是人学”》。但学者吴泰昌于1962年6月撰文指出:“文学是‘人学’,把文学叫作‘人学’,均非高尔基的原话,而是引用者的转述。”据此,学者刘保端在1980年代经过严谨的考证之后,提出“当然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是各种各样的人,是由于各种

各样的人活动其间而构成的社会政治历史现象。但是‘文学即人学’这句话并不出自高尔基之口,因此说‘高尔基把文学(或艺术)叫人学’这一命题是不存在的。”(刘保端 219-220)对此,钱谷融后来也部分承认了学者刘保端的学术观点:即“文学是人学”这句话不是高尔基所说的,并在以后仔细查找这句话的出处,最终查到了这句话是来自于法国的泰纳,“记得还是在90年代的某一天,我偶然翻阅了泰纳(Hippolyte A. Taine,一译丹纳)所写的英文版的《英国文学史》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泰纳用直白的语言说:‘literature, it is the study of man’。泰纳生于1828年,比高尔基要早出生40年,‘文学是人学’这句话的发明权,不应该属于高尔基,而是应该属于泰纳。”但以后学者刘为钦又考证出“文学是人学”不是泰纳所说(刘为钦 160-72)。

既然如此,“文学是人学”这句话的发明权就应该是属于钱谷融。钱谷融后来回忆道,“我原来在题目上是既未加引号,也没有‘论’字的,就叫做:文学是人学。……那么,后来题目怎么会变成《论‘文学是人学’》呢?那是因为接受了许杰先生的意见而改的”(《艺术·人·真诚》12-13)。可见,钱谷融在文章的题目上大费周章,不是出于纯粹好玩,而是大有深意的。后来钱谷融在接受别人的采访时,终于把他的真实意图给清楚地道了出来:“事实上我当时是借高尔基的话来发表我的观点。论文的题目开始不是这样的,我起的题目是《文学是人学》,没有‘论’,也没有引号。我们系主任许杰说,你加一个‘论’,加个引号,打出高尔基的招牌,借权威说自己的话。他出了这个点子,就成了《论‘文学是人学’》。我提出一个理论比较容易成为靶子,我论高尔基的‘理论’就比较好”(樊克宁,“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在钱谷融看来,只有借助高尔基的权威理论,才能不容易成为别人批判的靶子,而且与此同时,也可以把自己独立的学术见解熨帖自如地表达出来。因此,题目的改动只是钱谷融的一种比较稳妥的叙述策略,这是在一体化的体制下,学术自由环境的缺失所造成的,让我们体察到当时钱谷融文学批评的艰难处境,也显示出他特有的睿智与令人敬佩的学术勇气。

当然,这种写作动机的矛盾必然会渗透到论文的写作中。果然,通读《论“文学是人学”》之

后,我们发现其中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主要体现在人道主义文学思想与当时主流文论话语之间的冲突。总体来看,这种冲突就表现在文学性与政治性、大写集体之“人”与活泼泼的独立个性的人之间的对立。具体来看,有以下矛盾:

第一,与文学反映现实之间的矛盾。钱谷融认为文学的首要任务是要写出活生生的人出来,而不是反映整体现实。但如何处理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呢?钱谷融所用的策略是用部分代替整体,把活生生的人等同客观现实的方法。所以,他写道:“人和人的生活,本来是无法加以割裂的,但是,这中间有主从之分。人是生活的主人,是社会现实的主人,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论‘文学是人学’”46)。在这里,只要我们稍加进行逻辑的推理,就会发现钱谷融的矛盾之处。既然钱谷融承认人与社会有主从之分,那也就等于承认了人与社会现实的区别,二者是不能完全等同的。而且从常识上来看,现实除了人和人的生活,还有动物、植物、无机物等非人的现实存在。但钱谷融却硬说“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实”。可见,钱谷融这里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承认文学应该反映整体的现实和生活本质等抽象空洞的观念,而在于文学要写出具体的有个性的人,但他又不能公开反对,所以就只能采用这种调和的方法。

第二,与文学人民性的矛盾。请看:

我必须作如下的声明与辩解:第一,如我上面所说,我决不是否认人民性原则和现实主义原则的重大意义,我只是认为这两个原则不能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最根本的和普遍适用的原则。我也并不认为人道主义原则就是评价文学作品的唯一可靠的、充分有效的标准,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标准。至于说到人道主义与人民性、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那么,我认为它们决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可以这样说,人道主义是构成人民性与现实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哪儿没有人道主义,哪儿也就不会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论‘文学是人学’”45)

按照钱谷融的逻辑推理,既然他承认人道主义与人民性、现实主义的不对立和紧密的联系,人道主义是人民性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人道主义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最低标准和普遍标准,从而也就间接承认了人民性也是评价文学评价的一条基本标准,至少可以说人道主义的人民性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普遍标准。但钱谷融却只承认人道主义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普遍标准,而不承认人民性也是一个普遍标准,而是认为人民性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最高标准,既然是最高的标准,那就不一定对任何作品都适用的。这种行文逻辑的矛盾也向我们揭示了钱谷融纠结的复杂心态。一方面钱谷融由作家要写出活生生的有个性的人的文学事实出发,赞成人道主义,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漠视主流文论话语中的人民性、阶级性。所以,他就采取了似褒实贬的叙述策略,以文学的最低标准和最高标准的划分来宣扬文学的人道主义,而贬低和否定文学的人民性、阶级性。

实际上,文中还有不少如此硬说的矛盾与曲折遮掩的地方,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就不再完全例举出来。真够为难钱谷融的!但如果我们对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的写作体察就此结束,不再继续向前深入,这无疑又对钱谷融的良苦用心作了简单化的处理,在人情和学理上都显示出我们后辈对前辈的失之尊重。

事实上,钱谷融的这些矛盾还显示出他的更深层用意所在。学者王达敏曾说,“在政治主控一切的时代,力主人道主义而忽视人民性、阶级性、现实主义是要承担宣扬人性论、超阶级论,取消阶级性的罪名的。思想敏锐而心性温善的钱谷融先生只能妥协,用心良苦地调和二者之间的对立性,给出了一个明知说不好偏偏还要硬说的折中解释”(王达敏 59)。这里的“调和”二字用得很好,但“调和”并不等于和稀泥,不明是非,以牺牲学术的学理性和严谨性为代价,向对立方作毫无原则的妥协和投降,显然,钱谷融并没有这样做。钱谷融的“调和”除了不与之对立外,在质疑主流文论的局限之时,努力地将自己的文学主张整合到主流文论之中,使之能够被接纳,在主流文论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使彼此间互渗互补,这样既能够宣传和保护自己的文学主张,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主流文论的不足所带来的文学概念化、公式化等诸多弊病,所以,钱谷融深情地呼唤

道：“记住文学是‘人学’，那么，我们在文艺方面所犯的许多错误，所招致的许多不健康的现象或者就都可以避免了”（《论“文学是人学”》45）。

三、批判与抗争：“人学”的守持

尽管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小心谨慎，处处预警，但其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争论和批判的命运。

事实上，这篇文章在刚刚写成，还没发表之时，就已经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上引起了争论和批评。之后，这篇文章被上海文学杂志《文艺月报》所注意。据钱谷融回忆，当时《文艺月报》编辑部理论组在看过和认真讨论之后，认为《论“文学是人学”》“‘既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修正主义的’”（《文学的魅力》37），可以发表。然而，《论“文学是人学”》的发表并没有如钱谷融所回忆的那么轻松，其间也是经历了一段颇为曲折的过程。后来，亲历了《论“文学是人学”》发表的《文艺月报》的工作人员曾文渊撰文回忆：“以群同志虽然不同意《论‘文学是人学’》的基本观点，仍然赞同编辑部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发表出来讨论”；“理论组组长是姚文元，他是作为‘新生力量’调进作协的，当时甚红，颇受重视。姚文元对《论‘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如同他后来文章（批判文学中的人性论）所表明的那样，但他从‘钓鱼’和‘引蛇出洞’的策略出发，也主张全文刊发，且态度甚为坚决”（曾文渊 93,90）。可见，虽然《文艺月报》内部一致同意其发表，但对其中的观点和发表的目的却有不同看法，并分化为不同的两派：一派是以执行终审编委以群为代表，认为此文是一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非马克思主义论文，但同意发表出来进行学术争鸣；另一派是以姚文元为代表的个人，对之持全面否定和政治批判的态度，主张发表“钓鱼”。

现在清楚了，《文艺月报》内部两派不同论点已体现出合理与合法的交锋。合法是指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改造的文学规范，而合理则是遵循学术自由争鸣下的学理性。因此，从发表过程中的合理与合法的论争，却在发表之后，在反右运动的政治干扰之下，逐步演变为唯一的合法性之批判，学术的平等对话已完全转变为单一的政治压制。

据笔者查阅史料发现，这场批判以1957年的下半年到1958年的上半年最为猛烈，而且批判的阵地又以上海的《文艺月报》杂志为中心，直接批判钱谷融的文章就多达11篇，如《“人道主义”可以说明一切吗？》、《我们和钱谷融在几个基本问题上的分歧》、《论“人”和“现实”——驳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论“人学”与人道主义》等文章，而间接批判的文章就更是不胜枚举。批判的结果以1958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所编辑和出版《“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为标志，并对这场批判进行了合法性的政治辩护与总结：

“论‘文学是人学’”是一篇系统的宣传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文章，它广泛地涉及到文艺理论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从文学反对现实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命题出发，用所谓人道主义线索把许多问题联系起来，企图以此来消解一切文学现象。这就是这篇论文的修正主义的“理论体系”。而与马克思阶级论相对立的“人性论”，却又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基础。

“论‘文学是人学’”在逻辑方法上虽然和一切修正主义的逻辑一样，以偏概全，片面曲解等等，但这篇论文就其修正主义文艺观点的系统化来说，却是有代表性的。这种观点的出现，是阶级斗争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是资产阶级思想趁着两类矛盾问题的提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所作的反攻。（“前言”1）

从上所引，我们不难发现《论“文学是人学”》被批判的“罪状”有两条：其一，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与马克思的阶级论相对立；其二，具有系统化和代表性，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进行反攻。换言之，《论“文学是人学”》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基本思想：作家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思想背道而驰，犯了根本性的政治立场错误，不具有政治合法性，“毒害”甚深，实应受到讨伐与斗争。因此，批判者普遍认为“钱谷融同志的文章远离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原则，充满

着修正主义的声调,从整个倾向来看,是非常不健康的”(罗竹风);“对于这种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表现,我们不能也不可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禁止它们表现出来,而只能用‘争鸣’的方法,指出它的谬误,缩小它的影响,直至人人都知道它是‘毒草’而自觉地加以铲除。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也正好可以在和唯心主义文艺观点的斗争中发展”(陈辽);“不,这一切都不是什么言之成理的新鲜见解,这不过是从资产阶级文学见解里东抄西袭凑成的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文学理论,是资产阶级右派在文学领域里反对党的文艺思想的最完整的纲领”(李希凡)。

在这种疾风暴雨式的政治批判之下,钱谷融会如何应对呢?一般来看,有三种道路可供钱谷融抉择:一是选择沉默,不予回应;二是否定自己的学术思想,向批判者屈服;三是继续坚持,毫不动摇。令人敬佩的是钱谷融选择了最艰难的第三种道路,拥抱自己认可的学术真理,并继续申辩与维护。

当我读到最初发表的一些批评文章时,我本来是想就一些问题进一步申述我的观点,提出答辩的。但后来,反右运动的浪潮愈卷愈猛,对我的批判也越来越凶,我也不由得愈来愈感到自己世界观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了。我真诚地认为我最应该做的工作是自我检查,而不是什么对别人的批判进行答辩。于是就在这一年的10月26日,写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自我批判提纲”67)。

这段话实已透露出钱谷融早在接触最初发表的批评文章之时,就已不同意这些人的批判,并产生了不满的抵触情绪,只不过由于政治形式的严峻而暂时放弃了申述。但钱谷融还是在1957年的10月26日写下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进行答辩。

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论“文学是人学”》的要点,二是钱谷融当时写作《论“文学是人学”》的想法,三是钱谷融的自我认识。而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发表在《文艺研究》上《〈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

纲》的论文只是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已被删除。其删除原因,钱谷融在《关于〈论“文学是人学”〉——三点说明》中进行了说明:

我本来是要他们就照原来的样子,连同“自我批判”部分全文发表的。编辑部看后,觉得自我批判部分有些提法相当“左”,当时既难免有“违心”的地方,今天究竟怎么看,应该稍加说明。但我觉得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从我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一时也无力来做这个工作。如果让它就照原来的样子发表,又确乎是不妥当的。因此去信要他们把稿子还给我,不要发表了。他们不允,还是坚持要我改。盛情难却,我就只得采取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的老办法,去掉原稿中的自我批判部分,只把其中“当时的想法”一部分拿来发表(67-68)。

由此可知,原文中的自我批判部分,从政治立场来看,比较“左”,虽然现在我们已无法查找,但从钱谷融的自述中,我们还是可以推测出这是钱谷融对自我世界观的检讨:“我在自我批判中是极力在强使自己接受当时一些批判者的观点的,自然难免有违心的地方”。(“自我批判提纲”7)因此所谓的“自我批判”也只是钱谷融违心地对当时政治认同所作出的无奈与被迫选择。

更为可贵的是,钱谷融对这篇文章结构是做了精心安排的,第二部分的写作《论“文学是人学”》想法与第三部分的自我认识是各自成章独立的,并没有混杂在一起。这实已体现出钱谷融的自我批判态度:其一,政治与文学应该各自独立,不应该以政治代替文学或者以文学来迎合政治;其二,《论“文学是人学”》是一篇学术文章,只应在学理层面中进行争鸣,不应该上升到政治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钱谷融不仅没有为了迎合现实的政治需要,否定和修改自己原来的文学观点,而是继续进行申辩,为文学的合理性作出极为严肃和认真的探讨。其辩护的要点囊括了《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五个基本观点:文学的任务、关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关于评价文学作

品的标准、关于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关于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

事实上,除了辩护之外,钱谷融还在这篇文章中对《论“文学是人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推进,这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第一,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在《论“文学是人学”》中钱谷融只是强调抓住了活生生的人,就写出了社会现实。但人只是现实的一部分,二者并不等同。正如有人所批判的:“钱谷融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还在于他把人和现实看作是同一个东西,把两者等同起来了”(陈辽)。所以,钱谷融在此文中不得不做出回应。为此,钱谷融认为“我认为在文艺中,所谓现实就应该是指的人的个性(人的思想和行动,理想和愿望)。……所以人,可以说就是具体的现实。而一般观念中的现实。只能是文艺的背景而非对象,只能是文艺的出发点而非目标”(“自我批判提纲”8)。在钱谷融看来,现实分为两种:观念上的现实和具体的现实。具体的现实就是文艺中的现实,指的是人的个性,而观念上的现实只能是文艺的背景而非表现对象。这样一来,钱谷融就把文学抒写活生生的、有个性的人巧妙地置换进文学反映现实的主流文论中,对自己的文学思想进行了既合理又合法的辩护。

第二,人道主义与人性的关系。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中没有直接讨论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关系,并还一再避免别人不要把他的人道主义等同于人性论,如“这里,我就难免会遭到如下的许许多多的责难:……你这种说法,是不是一种超阶级的文学观、一种近乎人性论的文学论呢?”(45)。钱谷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当时的“人性论”已经被政治化和敌对化了,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和压制。但客观地说,钱谷融的人道主义实际上来源于普遍的人性论思想,是对人性的肯定与发扬。所以有人对此发难:“钱谷融同志虽然也赶紧作了说明,说是人道主义并不排斥阶级性,它和抽象的人性论倒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我们认为他所标榜的人道主义没有阶级的内容,飘飘荡荡而无所依附。这种抽调阶级内容的人道主义,的确是发源于人性论。作者可能会不以为然,但是事实毕竟还是事实,实际上那不过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人性论,它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不相容的”(罗竹

风)。应当指出,这个批判是非常尖锐的,直中靶心,直接把矛头指向钱谷融对人性论的回避。在此情境下,钱谷融对别人的批判不可置若罔闻,必须做出学理上的说明与论证。

首先,钱谷融对人性论的合理性进行了辩护:“我也知道我这种想法是颇有人性论的倾向的。但我以为马克思主义者本来并不否定人性的存在。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到有没有人性这东西时,也说当然是有的。文学既然是以人为对象(即使写的是动物,是自然界,也必是人化了的动物,人化了的自然界),当然非以人性为基础不可,离开了人性,不但很难引起人的兴趣而且也是人所无法理解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所产生的伟大作品之所以能为全人类所爱好,其原因就是由于有普遍人性作为共同的基础”(“自我批判提纲”10-11)。从此,我们可以看出,钱谷融的辩护非常巧妙,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否定人性的存在;然后毛主席也肯定人性的存在,这就是为人性论进行合法的辩护。最后才从文学的共鸣也是有了普遍的人性为基础才产生的,进行学理性的辩护。

其次,钱谷融证明了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所谓人道主义,我以为就是这种人性的肯定与发扬。文学既以人为对象,既以影响人、教育人为目的,就应该发扬人性、提高人性,就应该以合于人道主义的精神为原则。我认为人道主义原则与阶级性原则是并不矛盾的,只有历史上的先进阶级才能发展人性,才能讲人道主义。而那些落后的、反动的阶级,就只能阻碍人性的发展,甚至戕害人性”(“自我批判提纲”11)。换言之,人道主义就是对人性的肯定与发扬,先进阶级才讲人道主义和发展人性,落后阶级则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加以严重扭曲与践踏。

虽然当时文艺界对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的集中批判在1958年的上半年就已基本结束,但对其思想的批判却是在十七年时期一直存在着,只不过是随着政治形式的或紧或松而表现为批判的力度也或大或小。但钱谷融却并没有屈服,一直为之进行辩护,宣扬学术的真理性。所以,“人学”的论争一直延续着。

1959年,钱谷融在建国十周年大庆之际,受到学校的号召和动员,又写了《〈雷雨〉人物片论》(后改名为《雷雨》人物谈),但还没有发表之时,

就遭到了批判。据钱谷融回忆,“教研组认为我的观点有问题,《上海文艺》也决定不予发表。系里并召开了一次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会议,还邀请了校外的同行来参加;会上又几乎是一致认为我的文章美化周朴园和繁漪,宣扬人性论,是《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的反动观点的具体应用,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批判”(《艺术·人·真诚》13-14)。

钱谷融除了写文章进行辩护,而且还在各种会议中进行抗争。1960年春天,上海作协召开会员大会,总结文学工作,但由于有人在会议上全面否定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这触怒了钱谷融、蒋孔阳、任钧等人。因为在钱谷融看来,“伟大的现实主义巴尔扎克和狄更斯,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伟大的浪漫主义者拜伦与雨果也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论‘文学是人学’》49)所以,钱谷融在会议上“于是忍不住讲了几句,这下就抓住不放。这个讨论会断断续续开了七七四十九天,从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转到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主要对象是我和蒋孔阳同志”(《艺术·人·真诚》14)。对此,其他人的回忆也支持了钱谷融的这一说法:“1960年春天,作协上海分会召开会员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上海的文学工作,钱先生提了点不同的意见,并谈了他对19世纪欧洲文学的若干看法,就被认为是坚持《论‘文学是人学’》的‘错误’观点,‘要求社会主义文学表现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蒋孔阳、任钧先生一起被大会批、小会批,批批停停,开了49天会议,那可以看成是‘人学’论争的延伸,使钱先生受到更大的冲击和磨难”(曾文渊93)。

接下来,这种批判被扩大化,华东师范大学内部也及时召开了对钱谷融的持续批判大会,但钱谷融同样奋起抗争,据他回忆,“我一面对大家的帮助表示感谢,一面也稍稍申述了一下自己的观点,作了一些辩护”(《艺术·人·真诚》14)。然而,抗争的结果却是,钱谷融“于是就又受到了更大规模的更加严厉的批判。会后不久,我十二指肠溃疡大出血,住进了医院”(《艺术·人·真诚》14)。

虽然钱谷融的不断抗争充满了艰难,经常要承受高压政治所带来的心灵磨难,但恰好实现了他对《论‘文学是人学’》发表之前所作的“人学”坚守宣言:“我也知道,文章发表后免不了会受到

很多的批评、指责的,但根据‘双百方针’,我也完全可以进一步申述观点,为自己辩护,并提出反批评。真理总是愈辩愈明,最后服从真理就是了”(《文学的魅力》138)。对于钱谷融而言,文人的可贵品质,“就是以艺术和学术为生命的自足存在,并将自我生命投掷其中,甚至不惜为之奉献一切,艺术和学术就是目的,只能为艺术和学术而写”(钱理群7)。这表征出他不事王侯、服从真理的文人氣息。正如学者钱理群所指出的:“钱先生说的‘文人氣息’,主要是指传统士大夫所坚守的为人做事的基本原则,而且是和现代独立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相一致的”(10)。

结 语

在十七年文学批评中,钱谷融经历了从政治认同的焦虑到文学身份的回归,再到“人学”的坚守三个人生的重要阶段,即如钱谷融所言:“解放初,我的确很亢奋了一阵子,有过‘狂飙突进时代’那种心情。但过不多久,运动一个接一个地来,起初尽管感到非常违反我的本性,我还是尽力约束着自己,尽量去适应它。一直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兴起,对我的心灵震撼之剧烈,使我实在无法承受。我虽没有在运动中被划成右派,但从此被打入了‘另册’,即使仍旧想顺应潮流,跟上形势;却再也跟不上,再也无法适应了。于是我又一天天的懒散下去,愈来愈无所作为,其实是再也不敢有所作为了”(《艺术·人·真诚》619)。而且在每一个阶段中,钱谷融都做到了不失自我,保持自我,体现了铮铮铁骨的文人氣息,为无数后辈学人树立了可贵的人文标杆。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辽:《我们和钱谷融在几个基本问题上的分歧》,《雨花》1957年9月号。

[Chen, Liao. Our Disagreements with Qian Gurong over Some Basic Questions. "Yu Hua". 1957(9).]

崔晓麟:《重塑与思考——1951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Cui, Xiaolin. *Remodeling and Reflection: A Study of Ideological Reform Movement of College Intellectuals around 1951*. Beijing: CPC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2005.]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及原因分析》,《广西社

- 会科学》11(2003):140-42。
- [---. “An Analysis of the Mentality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New China.” *Guangxi Social Science*, 2003(11):140-42.]
- 樊克宁:《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性格是“不事王侯”》,《羊城晚报》,2008年1月9日。
- [Fan, Kening. “The Typical Chinese Intellectuals’ Character is ‘Serving No High Officials.’” *Yangcheng Evening Paper*. January 9, 2008.]
- 刘保端:《高尔基如是说——文学即人学考》,《新文学论丛》1980(1):219-20。
- [Liu, Baoduan. “So Spake Gorky: On Literary Study is Humanistic Study’.” *New Literature Symposium*. 1980(1):66-72.]
- 刘为钦:《“文学是人学”之命题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2010):160-72。
- [Liu, Weiqin. “A Reflection on ‘Literary Study is Humanistic Study’.” *China Social Sciences*. 2010(1):160-72.]
- 罗竹风:《“人道主义”可以说明一切吗?》,《文艺月报》1957年9月号。
- [Luo, Zhufeng. “Can ‘Humanism’ Explain Everything?” *Literature and Arts Monthly*. 1957(9).]
- 李希凡:《论“人”和“现实”——驳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12月号。
- [Li, Xifan. “On Human and Reality: Refuting Qian Gurong’s ‘Literary Study is Humanistic Study’.” *Literature and Arts Monthly*. 1957(12).]
- 新文艺出版社编:《“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第一集)的《前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
- [New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 ed. “Preface.” *Essays Criticizing ‘Literary Study is Humanistic Study’* (Vol. 1). Shanghai: New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 1958.]
- 钱谷融:《艺术·人·真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 [Qian, Gurong. *Art, Man, Sincerity*.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995.]
- :《散淡人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
- [---. *Carefree Life*.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 Press. 2001.]
- :《钱谷融文集·文论卷:文学是人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 [---. *Collected Works of Qian Gurong: Literary Theory*.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论“文学是人学”》,《文艺月报》,1957年5月号。
- [---. “On ‘Literary Study is Humanistic Study.’” *Literature and Arts Monthly*. 1957(5).]
- :《关于〈论“文学是人学”〉——三点说明》,《新文学论丛》,1(1981):66-72。
- [---. “About ‘Literary Study is Humanistic Study’: Three Explanatory Notes.” *New Literature Symposium*. 1981(1):66-72.]
- :《闲斋书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 [---. *Letters from the Carefree Studio*.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
- :《文学的魅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
- [---. *The Charm of Literature*. Jinan: Shandong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 1986.]
- :《〈论“文学是人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文艺研究》,3(1980):7-13。
- [---. “An Outline of Self Criticism about the Article ‘Literary Study is Humanistic Study’.” *Literary and Arts Study*. 1980(3):7-13.]
- 钱理群:《读钱谷融》,《现代中文学刊》,5(2010):6-16。
- [Qian, Liqun. “Reading Mr. Qian Gurong.”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2010(5):6-16]
- 王达敏:《“十七年文学”人道主义思潮及其命运》,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2010):50-60。
- [Wang, Dam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stic Trend i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from 1949 to 1966.” *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2010(5):50-60.]
- 曾文渊:《“人学”论争杂忆》,《上海文学》,4(2004):89-93。
- [Zeng, Wenyan. “Recollections on the Debate on ‘Humanistic Study’.” *Shanghai Literature*. 2004(4):89-93.]
- 庄锡华:《中国现代文论家论》。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
- [Zhuang, Xihua. *A Study on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Critics*. Beijing: Guangming Daily Press, 2006.]

(责任编辑:王峰)